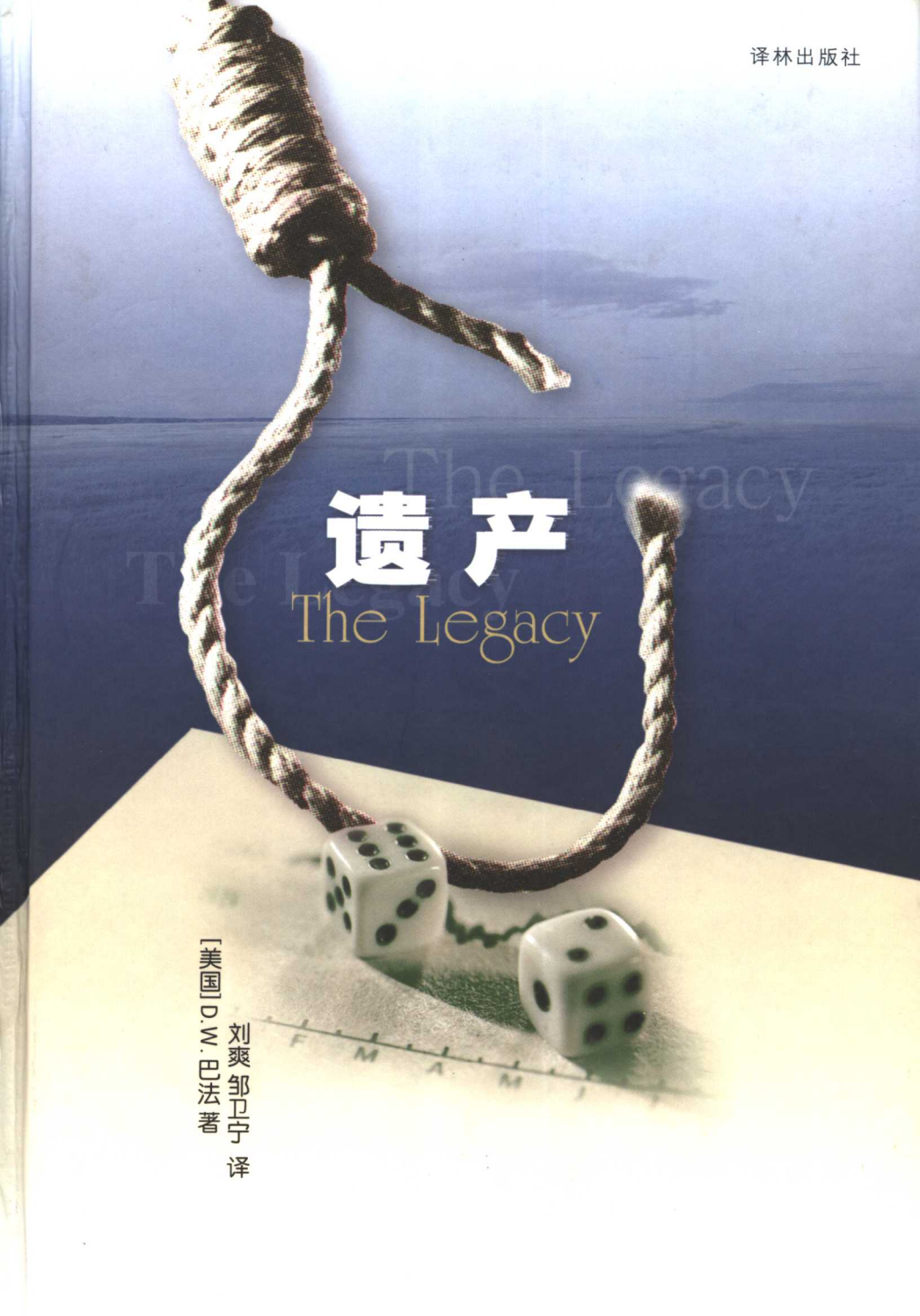


译林出版社



遗产

The Legacy

〔美国〕D.W.巴法著
刘爽邹卫宁译



遗产

[美国] D.W. 巴法 著 刘爽 邹卫宁 译

THE LEGACY

译林出版社



光环背后的黑幕 法律之上的正义

——谈巴法新作《遗产》

罗贻荣

《遗产》作者 D. W. 巴法读过法律、政治、哲学和国际关系专业，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又做过十年辩护律师，还做过一位参议员的高级助手。长期的法律实践和深厚的生活积累，孕育出他的《辩护律师》、《审判》、《遗产》和《主要证人》等精彩小说。

“巴法式”追凶情节

巴法的小说有这样一个情节模式：

案发：一个位高权重者被杀，然后嫌犯被抓，但嫌犯被认为是无辜的；

追凶：怀疑对象一个一个出现，又一个一个被排除，案情层层揭示；

真相：起初追凶有两个动机，一是解救无辜嫌犯，为其洗清罪名；二是为死者伸张正义。随着案情真相的彻底显露，受害者本人已变得没有正义可伸张，因为受害者的死罪有应得，而真凶则另有隐情，情有可原。此时，追凶的惟一目的是解救无辜嫌犯，抓住凶手本身已无关紧要；

平衡：最后对案件的处理是在法律与公正和情感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在这种情节模式中,真凶情有可原、死者罪有应得的模式至少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揭露社会黑幕;二是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奇,从而产生震撼效果。而平衡的模式则体现了作者巴法的正义观和价值观。

案情层层揭示

正在竞选州长并有望登上总统宝座的参议员富勒顿被人枪杀在自己的车里,在现场发现并被警察开枪打伤的黑人青年哈迈尔·华盛顿被捕,辩护律师安托内利接受了这个谁也不敢碰的案子。要为哈迈尔洗清罪名,就必须找到真正的凶手及幕后操纵者。于是案情随着安托内利漫长而又艰苦的调查被层层揭示,富勒顿的妻子、富勒顿的政治秘书阿莉娅及其父亲——旧金山市超级富豪戈德曼、马歇尔州长、总统在现场打伤并逮捕哈迈尔的两位警官陆续登场。在排除富勒顿妻子情杀的可能性后,其他人可能的谋杀动机先后都在安托内利的脑子里清晰起来:戈德曼父女先是利用富勒顿继而想取而代之;马歇尔州长要除掉自己的政治对手;总统也有可能想除掉自己的政治对手,而且,富勒顿通敌叛国的真相有可能被曝光,这将对与富勒顿同为民主党的总统极为不利……安托内利认定这是一场政治谋杀,它有着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他苦于找不到确切证据,感到自己处境险恶。尽管他在法庭上以自己高超的辩护技巧揭露了两位警察的谎言,使人们怀疑州长有除掉政治对手的习惯,但最后陪审团的判决结果仍然是:哈迈尔的谋杀罪名成立。

人物的多角度透视

作者通过安托内利一步一步的调查,从多个角度和不同的侧

面揭示了作品的中心人物之一富勒顿的立体形象。既从熟知政治内幕的国会议员列尼的角度,从前克格勃特工安德烈的角度看富勒顿,又从深爱着他的妻子的角度和暗恋他的普通妇女的角度看富勒顿。这使得人物显得真实生动而富有立体感。在不同人的眼里,他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天才的、有亲和力的、有责任感政治家;一个让所有见过他的女人为之倾倒的魅力四射的男人;一个谎话连篇的政客;一个劣迹斑斑的受贿者;一个为了筹到竞选经费不惜向敌人出卖国家机密的叛国者。他是《遗产》塑造的一个成功的政客和野心家的典型。

作者站在俯瞰人生的高度,对富勒顿的结局抱着一丝悲悯和感叹:

他迷恋着他将要成为的那种人,他的心生活在未来,以至于他为他的目标而不得不做的事情都被埋在了过去,几乎在他做完那些事情之前就被遗忘了。

悬念不断,高潮不期而至

情节小说的第一要素是悬念,悬念就是提出问题后尽可能拖延回答。本书的中心悬念是:谁是杀害富勒顿的凶手?解开这个悬念的努力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随着情节的发展,主悬念先后派生出一系列的次悬念:哈迈尔是真正的凶手吗?富勒顿的妻子是凶手吗?富勒顿的女秘书阿莉娅是凶手吗?凶手或幕后策划者是戈德曼?州长?总统?头两个次悬念先后被解开,哈迈尔和富勒顿妻子作案的可能性被排除,后来焦点便集中在政坛与商界的层层内幕和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上。主悬念最后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富勒顿之死是高层利益集团的共谋吗?

与主悬念并行的还有其他悬念:克雷文为何要帮杀人嫌疑犯

哈迈尔？安德烈为何多次跟踪“我”？两位警察是否栽赃？为何要栽赃？戈德曼父女会如何利用富勒顿的死？……

众多的悬念形成小说情节持续不断的紧张，使读者有兴趣将小说一口气读下去。

当主悬念仍然无法解开，陪审团判定哈迈尔的谋杀罪名成立，情节似乎发展到死胡同时，已经灰心绝望的办案律师无意中发现了解开这个悬念的钥匙。

我松开他的手，正准备转身离开，一个很大的马尼拉纸信封吸引了我的视线，信封的中间还盖着一个邮戳。

“是的，”克雷文注意到我在看它，就解释了一句，“我终于完成了。”

“阿卡迪·伯格多诺维奇？”我朝信封上扫了一眼，问道。

“是安德烈的弟弟。一切都由他继承。”

但读者此时还没有意识到，一个小小的信封将把故事情节带向高潮，直到我们跟随安托内利来到意大利的博迪盖拉，见到已经在安托内利亲眼目睹的那场大爆炸中“丧生”的安德烈。原来，安德烈在跟安托内利谈话时曾不经意地说过他没有兄弟姐妹，而现在，克雷文却告诉他，信封上的名字是安德烈的弟弟。这使安托内利做出这样的推理：如果安德烈杜撰了一个弟弟，他肯定也杜撰了自己的死亡。安德烈的最后出场和对案情真相的最后揭示无疑是这部小说的高潮。它给读者带来了最大的惊奇和震撼，同时也使整部小说的中心悬念最终解开。这个“惊奇”应该说是作者的得意之笔，是这部小说做了大量不着痕迹的铺垫，经过精心营造之后抖出的一个大“包袱”。这个“惊奇”还完成了富勒顿形象的塑造，揭示了他为了自己的野心不惜杀人灭口的冷面杀手的一面。

情节小说与社会小说

《遗产》显然是一部悬念不断的情节小说，但它也是一部社会小说。

它通过对职业政客富勒顿的调查和富勒顿谋杀案的审判，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美国官场现状图，揭示了美国司法和政治的内幕。在这里我们看到，州检察官和法官的政治野心 and 个人的好恶左右着他们在法庭上的言行，左右着他们对案件的态度和做出的判决；检察官和法官还彼此不服，相互拆台；检察官、州长、富商之间互相勾结利用；政客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惜谋杀前任，出卖国家……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公平、正义跟他们的个人利益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律师的品质与安托内利

安托内利无疑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正面形象，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法律工作者应有的品质：正义感和责任感。如果说他最初接手富勒顿谋杀案是因为表哥的面子和为了一举成名，那么在见到哈迈尔之后，就是一种要揭示真相、为无辜者鸣冤昭雪的正义感使他义无反顾。尽管在探案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和挫折，遭遇盯梢、绑架和死亡的威胁，他都不言放弃。作为一名辩护律师，安托内利在庭审中表现出高超的辩护技巧，比如他让作伪证的证人重复自己的证词，让其在一字不变的重复中暴露自己证词的虚假；还善于使用声东击西的手法让对手暴露自己的证词前后矛盾，迫使其说出真相；作为探案者，他能根据别人闲聊中的只言片语发现破绽，找到走出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此书可作為一部有启发意义的律师读本。

巴法塑造的律师形象的真实性受到好评。尽管安托内利具备上述品质,但他不是一个无所不能、完美无缺的超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遇到挫折时会气馁,接手案子时会考虑经济收入,特别是,他作为一个探案者,不是一个无所不晓的“神探”,他对案件的大胆勇敢的推测,尽管有它的社会基础,但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最后是幸运、过人的记忆力和推理能力使他得以破案。

法律与正义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安托内利却认为法律与公正是有区别的。在他看来,法律常常跟正义毫无关系,甚至是违背正义的,但是毫无疑问,他所追求的永远是正义和公平。巴法的小说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法律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在法律与正义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这一冲突的问题。

在《遗产》的姊妹篇《辩护律师》中,安托内利曾经在一次审判中运用法律条款为一个当事人赢得无罪判决,而他知道,那位当事人在一桩重案中是有罪的;在另一次审判中,他又违反法律而努力使一位他知道完全无辜的当事人获得无罪判决。法律可以帮助你赢得正义,也会妨碍你伸张正义。所以,在巴法看来,法学院里学不到正义,要学习正义,应该从柏拉图开始。在《遗产》中,我们看到,安德烈谋杀富勒顿继而诈死严重地触犯了法律,但是安托内利认为,富勒顿企图杀人灭口在先,而且罪不可赦,所以对安德烈的谋杀罪不予追究;安托内利要求安德烈从他的“遗产”中拿出一笔钱作为对哈迈尔的补偿,也对他的诈死不予追究。而这一切,都是与法律相违背的。应该说,这些情节和它们所蕴含的观点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重大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如果法律不能伸张正义、甚至违背正义,就说明法律至少是不完善的;一个真正的、伟大的法律工作者,永远把维护正义作为自己的第一目标。

致 谢

感谢我的代理人温蒂·舍曼,她的经验和判断又一次给了我不可替代的帮助;还有我的编辑罗伯·麦克马洪,他的辛勤工作促使我得以完成此书。

“天堂的风,从四面八方裹挟着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到那座黄金之城。”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之旧金山印象

第一章

我父母最后离婚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她之所以嫁给我父亲，只是因为当时她已经怀上了我。她说这话时的口气，好像确信我早就知道这事儿似的。她似乎已经断定，我早就明白——从一开始，就像事情可能发生的那样——她从来没爱过我父亲，这些年来之所以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只是为了能让我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长大。可是我却不像母亲期望的那么聪明，凡事也没什么先见之明。对我来说，我们的生活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也不曾发生过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即使每年夏天母亲都要独自带我出趟远门，那也不过是因为我父亲是个医生，他得留在病人能找到他的地方。

每年都是这样。我放假后不几天，母亲就带着我在火车站跟父亲道别，然后坐一宿火车去城里。母亲总是这么提起那个地方，她生在那儿，长在那儿，也是在那儿遇到了我父亲，那时他还是个大学生。“城里”，不管是在那儿住过，还是正住在那儿的人，都这么叫那个地方；要是你不能马上明白他们所说的“城里”就是旧金山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儿。

每年夏天，我们都去旧金山和母亲的姐姐住上一段时间。我的这位姨妈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住在那儿，室外没有玩耍的地方，我只好整天闷在家里。惟一的乐趣来自姨妈家比我大三岁的表哥鲍比。他看我挺可怜，就带我出去转转。有时候，我母亲穿上盛装，给我掖好被子道声晚安后，就会和我姨妈一起出去。等她们

离开家之后，鲍比和我就偷偷地从后门溜出去，到街上去转悠。当然我们也只不过是附近的酒吧周围，透过玻璃窗看看里面的热闹而已。有一次，我们尾随着两个水兵和他们召来的两个女人，到了他们的车前。我们一直等到他们的车窗玻璃上出现了雾气。该是我们猛敲车门，然后赶紧逃走的时候了。这一次，我们蹲下身子，挪到了驾驶座右边的车窗前。鲍比探起头朝车里看了看。他突然转过头来，脸上带着愤怒和惊恐的表情，紧紧抓住我的肩膀，拽着我使劲朝大街上跑去。他从来没对我提起过他看到了什么情景，他觉得我那个年龄还不会去做何猜想。

年复一年，母亲和我总是到城里过夏天，有时候过圣诞节也去那儿。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上中学。母亲仍然经常去看她姐姐，但是每次只住几个星期。我不清楚她这么快回来是因为想我，还是担心别人会对此有什么看法；不过即使她愿意告诉我，我对她的话也没有多大把握。无论她怎么说，那都不会是真话。我母亲从来都不是那种藐视传统的人，即使在她如此善于说谎的时候也是如此。我倒是遗传了她这种顾全面子的天分，这种天分能让人相信，所有我冒犯别人的地方都值得原谅，因为那些事儿不知怎么搞的总是别人的错。

母亲完成了她不得不做的事情，而且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我完成了学业，并且当上了律师。可是她更愿意我当个医生，即使我不能满足她的这个心愿，那至少也应该加入华尔街的某家公司。在律师这一行里，惟有那些夜校毕业的从业者，才愿意接手任何一件能搞到手的刑事案件，而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律师们就不会那样饥不择食。

母亲打算从此离开这个家。她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跟我唠唠叨叨。她的心里一直在思量：她为我作出的牺牲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因为我总像是有意跟她作对似的，让她的期望一次次化为泡影。她很愤怒地提醒我，虽然我的表哥并没有在哈佛受过教育，

可人家却已经成了旧金山一家最有名的大律师行的年轻合伙人。我最不想谈起这个话题，而她却偏偏只对此感兴趣。什么事都是鲍比，鲍比做得怎么怎么好，她多么希望我能做得更好。她固执地认为，就是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才连个起码的野心都没有。

她大声地数落着我，尽管我就站在她的面前，可她却更像是在自言自语，而且越说越来劲。以前她说起，她是因为怀了我才不得不跟我父亲结婚时，看不出她有明显的遗憾；而此刻，她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做，她说那时应该再等一等，等到我的亲生父亲离了婚，然后再跟他结婚就好了。

我现在想到这件事，还是感到有点奇怪。但当初她说到这事儿时，我并不在乎这究竟是不是真的，我在意的只是我父亲，我所知道的惟一的父亲，幸好他不知道这些。当我听到母亲说，她没把这些告诉我父亲，而且永远也不打算告诉他时，我简直对她充满了感激，因为她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只把这事儿告诉我。

此后，我们从没谈起过她最后离开我时所说的这一切。在随后的日子里，要是她不经意地提到父亲，我甚至从没有觉察到她的措辞中含有什么嘲讽的味道。以她的秉性，她应该已经忘记了曾经对我讲过的那些关于我身世的事情。她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能把不愉快的事情很快置于脑后。

假如那天她离开时对我所说的一切真是有所用意的话，我想那也仅仅是为了说服我，让我明白自己缺乏野心，并不是因为某种个人能力无法改变的遗传因素。听到她的那番话，我感到非常吃惊。她竟然一点也不了解我，因为我要比她想像的有野心得多，尽管我的野心并不表现在她所期望的那些事情上。我实在无意成为表哥那样的人：一个仅仅为富人钻税法的空子提供咨询的律师；一个从没办过一桩案子，也永远不想去办任何案子的律师。但是想想我母亲说的这些，我也没法责怪她。毕竟，在我和鲍比一起长大的日子里，他曾经是我的偶像，而且，他曾拥有过的一切是我永远

也没法超越的。鲍比在加利福尼亚一支最好的中学橄榄球队打主力后卫时，我只在波特兰的一支无名校队里做替补队员；他当选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美最佳运动员那年，我刚成为校队的主力。鲍比周围总有那么多想成为他朋友的人，也有那么多想和他一起出去的女孩，而我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总觉得不自在。即使到了高中快要毕业的年龄，我也还是过于拘谨，过于自闭，以至于连自己的社交圈都没有。

自从母亲不再带我到旧金山过暑假之后，我和鲍比就很少见面，不过我总是在远处关注着他生活中的大事。比如在他将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那年，他邀请过我参加他的婚礼，而我那时正在密执安大学读一年级，去参加他的婚礼，路途实在太远了。后来他的妻子死于癌症，我赶去参加了葬礼，那时我们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见面。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我收到鲍比手写的一封信，感谢我去参加葬礼，还说希望我们俩以后能经常见面。一年之后，我们又一起吃了一顿晚餐，那时我正在旧金山联邦地区法院处理一件案子。算起来，那次见面也是两年前的事了。此后我一直没有鲍比的消息，直到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和他的搭档见上一面，谈谈关于接办一件案子的事儿。那可是一件会让全美国的辩护律师都不惜一切代价想要争取到的案子。

从杰里米·富勒顿被谋杀的那个晚上开始，这个案子就成了所有人谈论的焦点。他的尸体是在一辆停在旧金山街道上的汽车里被发现的。谋杀美利坚合众国国会议员当然是头条新闻，何况富勒顿还是民主党参加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的候选人。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根据目前所有的报道，富勒顿竞选州长的惟一原因，是他认为那将是他成为美国总统的最好机会。

鲍比向我解释说，警方已经逮捕了一个犯罪嫌疑人，但是他的搭档阿尔伯特·克雷文似乎要向警方证实他们抓错了人。即使他们没有搞错，克雷文毕竟也和疑犯的母亲相识多年，他答应这位母

亲要尽最大的努力，替她儿子找一位辩护律师。

“这事儿不该有什么困难，”我对电话那边的鲍比说，“办这种案子能让人一下子出人头地，一个律师恐怕一辈子也难得碰上这样的机会，同行们都会排着队来要求接手这件案子吧。”

“城里没人敢碰这件案子，”鲍比回答说。

这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要知道，无论谁接手这案子，都会马上出名的。看来真有点不对劲儿。

“阿尔伯特答应那位母亲，会帮她儿子找个最好的律师。”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是多么崇拜鲍比，多么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不知道他给我打电话时，是不是也想起了这些往事。如果他这样说是在告诉我，他认为我就是那位最好的律师，我真的会更加喜欢他。他接着又告诉我，城里本来有好几个律师可以接手，不过他们都害怕这件案子可能会引起的连锁反应。

“连锁反应？”他话音刚落，我便脱口问道。我倒是不在乎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接下来的星期一，我一早坐飞机从波特兰赶往旧金山。飞机开始降落时，我从窗口向外望去——真不愧是他们所说的“城里”，它总是有着那么大的吸引力。即使在那些大桥还没开始修建，金门大桥尚未连接北岸，海湾大桥也还不曾连接东岸之前，就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乘轮渡在海湾来来往往。大桥建成之后，更多的人，或驾车，或坐公共汽车，或乘火车，纷纷拥入这座城市。每个人都想来这儿，然而，这座在小小的半岛地形上发展起来的都市，因为夹在大海和海湾之间，不可能再变得更大了。曼哈顿的那些阻光玻璃幕墙建筑绝不可能矗立在这种地方，在这里，地表下绵延数英里的断层任何时候出现一点轻微的移位，都可能使整座城市化做一片废墟，就像以前曾经发生过的那样。1906年发生的那场几乎破坏了一切的地震，把这座城市从一种更久远的毁灭中拯救了出来。

其他城市还在持续不断地向外膨胀着，每一幢崭新但却单调乏味的玻璃幕墙建筑，都在以不可遏制的姿态掠夺着城市的领空，用一种难以名状的灰色调子湮灭了城市独特的风情。而旧金山，无论你离开她多久，无论你自己有多大变化，这里依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依然是一个仿佛在你离开后，什么都不曾发生过的地方；即使你一生中以前从未到过这里，她展现在你面前的仍然是亘古不变的容颜。不过现在这座城市，至少是在你亲眼目睹的那些地方，已经开始有所变化。人们以不可遏制的天才设想把数座大桥飞架于数英里宽的水流湍急的海湾之上，如今又发挥着同样的天才设想建起了一幢幢摩天大楼，在这些大楼的地基里铺设了巨大的钢圈，足以承受任何引起倒塌的其他震动。假使再有地震发生，这些摩天大厦只不过会左右摇摆一下，坍塌的将会是那些木制和混凝土结构的老房子。我的视线搜寻着那些建筑映在天际的轮廓线，沿着山坡直到水边，我终于辨认出轮渡大楼上的钟塔。不久前它还是旧金山的制高点，如今已经被淹没在玻璃和钢铁的高楼大厦之中了。

下了飞机，我看见鲍比已经在等我了。他站在迎接客人的人群之外，一看到我，他的嘴角便漾起一个热切的微笑。他站在那儿的姿势有点特别：肩膀稍微向前倾着，两腿分开，一双蓝眼睛不停地转动，仔细观察着四周的一切，警觉地准备迎接下一刻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那副姿势会让人觉得，好像在他跨出步子之前，就已经在行动了。只是在他真要行动的时候，你却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动作。

鲍比坚持替我提行李。我们走出机场时，加利福尼亚宜人的暖风迎面拂来。他扬起头朝四周张望了一会儿，然后扬了扬手。我以为他在招呼出租车，而开到路边来的，却是一辆早已等在半个街区之外的加长轿车。

我坐到后面的座位上，鲍比坐在我对面。他看上去有些变化，

人见老了，头发上也有了第一抹灰色，眼角上的皱纹也不觉地泄露了岁月的沧桑。然而他的笑容还是那么快捷、机警，不过少了一点神采，就像一盏灯在不知不觉之间开始暗淡下来。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他刚刚跟司机说完怎么走，就把头转过来对我说。“我知道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我非常感激你能来这儿。”

他的嗓音和以前一样清晰，但是说话的速度比我记忆中的慢了一点。

“一点儿也不是什么强人所难，”我对他说。“无论我接不接这个案子，我都很高兴你能想到我。”

他像要强调什么似的摇了摇头，好像是要让我明白我的想法并不正确，因为实际上另有其他原因。

“你想错了，让你来不是我的主意，是阿尔伯特·克雷文求我给你打电话的。他帮了我很多忙，还从来没让我帮他做点儿什么。这是我给你打电话的惟一原因：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拒绝他的理由。但是，我也明确告诉他了，我只是请你来和他谈谈，并不是让你来接这个案子。干不干由你来定。假如你不愿意，那也没问题。你不欠阿尔伯特什么情，也不欠我的情。你懂吗？”

这时，突然在我们正前方出现了一片金黄色的灯光，从山头一直延伸到海湾。城里到了。

鲍比看到了我眼里的神情。“考虑过在这儿住下去吗？”

我摇摇头说：“我想，我会思念家乡的雨。”说着，我有点儿虚伪地笑了笑。

下了高速路，加长轿车开始在街道上慢慢地蠕动。

“你在电话里说过‘连锁反应’，说这里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手这件案子；而刚才你又明确地告诉我，你并不是请我来接这个案子的。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愿意卷进这件事情呢？难道就是因为参议员富勒顿想当总统，而且据我所知，他的确很有可能当选的缘故？”

鲍比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大笑起来，然后又叹了口气。

“这根本就和富勒顿没有关系——怎么说也不是直接有关。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并为他的死感到不安。”

加长轿车在金融中心的一堵深灰色的围墙前停下来。这就是克雷文 & 莫立斯 & 豪尔公司总部，早在那些摩天大楼出现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这里创办了这家公司。他们的公司伴随着整个城市的发展而扩大。许多成立于旧金山建城早期的小银行、小商号创业初期就聘用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现在那些小银行和小商号，都已经是大型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了。当年这家公司每月赚取的费用，仅仅能维持一个月的经营开支，而现在，公司每天都在创造巨额利润；原先的三个合伙人，创业时也几乎一无所有，如今他们拥有的财富甚至超过他们曾经有过的最大胆的梦想。

莫立斯先生和豪尔先生早就从公司的法律事务中解脱了出来。他们偶尔来办公室，也只不过敷衍一下他们手下成打的年轻合伙人。这些年轻人都像奴隶似的替他们干活，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老板那样过上富有而悠闲的日子。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或者说，至少对那些一起步就渴望征服世界，而最终功成身退在棕榈泉择宅而居的律师们来说，他们的世界的确遵循这样的运行方式。

阿尔伯特·克雷文却是一个例外。他坚持说棕榈泉那里太热了，玩高尔夫球也太无聊。他这么说是不是真话，倒也无关紧要；假如他这么认为，他就完全可以这么说。不过，这都只是他随口说一说罢了。尤其是在某种场合，聊这个话题比直接回答别人的提问，比如他为什么如此勤奋工作，可要轻松多了。这么多年以来，他仍然是早上第一个来办公室，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在别人看来，他这个年纪还不得定期花上两个或是三个小时的时间，和他那些声名显赫的朋友共进午餐，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接受任何建议。